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八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四七期 ——  
(二〇〇五年八月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508a)

---

【各抒己见】毛泽东的悲哀：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具体操作原因	范立群
【研究报告】“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二）	何 蜀
【难忘岁月】《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七）	刘文忠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各抒己见】

毛泽东的悲哀：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具体操作原因

• 范立群 •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以悲剧收场的。毛泽东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与建立了新中国并列，作为了他毕生的两大成就，并作了反复强调，赌上了他一生的政治定位。然而，就在毛泽东去世不久，他的爱将“四人帮”被粉碎了。紧接着，他一手扶起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也在“两个凡是”和“实事求是”与邓小平的对决中，黯然下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文化大革命遭到了曾经被一度无情地一脚踢开和瘫痪了的整个干部体制的强烈反弹，被以文化大革命中所使用过的同样粗暴的大批判方式，在一片喊打声中，不容经过任何的理性分析，毫不留情地全盘否定了。

以毛泽东的聪明才智，他是应该能够预计到他所强调的第二个大成就，在他死后会有被全盘否定那么一天的。毛泽东在最后的几年里一再强调，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与建立了新中国并列，作为了他一生中的两大成就，可见他临死前的焦虑和不安。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他是多么的孤独和不甘，多么希望他的思想能被人理解和接受。毛泽东对“四人帮”也不看好，还是有所防范的，从他最后选择了在中央毫无根基的华国锋为接班人，作为一个在文革派和留下的中央老干部之间维持平衡的过渡性领袖，可见他的苦心和无奈。他寄希望于邓小平的能力和对他遗留下事业的忠诚，但又深感疑虑，几次举棋不定。十分不幸的是，毛泽东当年所担心将会

发生的事，在他死后几乎全部应验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审判“四人帮”时，江青声称，她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在文革中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张牙舞爪，嚣张跋扈，伙同他们的党羽制造了这么多冤假错案，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十年动乱。“四人帮”不但是恶狗，还是疯狗，更是笨狗。要说狗利用了主人的溺爱和放纵，往往只是出自贪食（贪功）和凶残（乱咬）的本性，说到底，还是主人在利用着狗，或者说没有控制和利用好狗，哪有反过来说，本末倒置的道理？文化大革命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按照他的理念，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一致同意”，“坚决贯彻执行”的全面支持下，亲自煽风点火，在他的全面掌控下开展的。“四人帮”只是按照他的战略步骤，帮着摇旗呐喊，敲锣打鼓，再加上小帮派野心的恶性膨胀，靠着主人的威望，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罢了。

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有在运动中的两个关键转折点的具体操作、政策和策略性的致命错误，造成了形势的大逆转，也有注定文革会失败思想和理论上的盲区，即发动文革的理由是否正确和充分？采用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再一次革命的走极端方式，是否真如毛泽东所认为的那样，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以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否能够成立？这些致命的根本性的问题。本文将只从运动中的具体操作、政策和策略性的错误层次来试图作出分析。

在本人“理解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说到，到了1967年2月底，经过反击“二月逆流”后，使毛泽东觉得胜券在握，形势一片大好。所有的阻力和障碍已经基本扫除，文革到了最后收口，集中力量完成全面夺权的收获期了。有中央文革在前台“冲锋陷阵”，有林彪团队的军事将领作后盾，有眼开眼闭，放任周恩来保护和收拢的一批“誓死效忠”毛泽东的中央老干部和老师作后备的制衡力量，毛泽东可以左右逢源，进退自如。也许是毛泽东对眼前的胜利在望，急于求成，过于乐观和自信，加上年老体衰，精力不济，放松了对他那一帮野心勃勃的下属的管束；也许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副统帅”团队的好大喜功，自以为是，擅自作主，各从自身集团的利益出发，不择手段，争权夺利，紧接着就犯下了两个致命的大错误，使整个文革形势发生了大逆转。

第一个大错误，是于1967年3月16日，由中共中央印发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国民党特务，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这么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配合批判刘，邓路线，反击“二月逆流”提供依据，为成批成批地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同时也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然而，这些材料即使属实，显然都是一些党中央早就掌握的二、三十年前的历史老材料。既然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没有对他们按叛徒作处理，在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也没有因为历史问题对这些人作过批判和斗争，而且还让他们在中央、政府和军队中居于高位，就必有其值得“谅解”的客观理由。这不是少数人可以任意操弄，瞒天过海，封得住口的。作出这种愚蠢行为的决策者，犯了画蛇添足的低级错误，简直是把人民当成了可以随便摆弄和欺骗的愚民。

这两份中央文件的公开化，虽然暂时达到了他们稳定大局的目的，实际效果却是灾难性的。这样不顾历史和诚信的做法，激起了受害者和知道事情发生始末真相的老干部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也正是因为此举的不合情理，引起了文革运动中的思想者，一批坚持独立思考，对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追根究底的热血青年的怀疑。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发出了“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使当时的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抓“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和“叛徒集团”的斗争迅速扩大化。中央文革小组和“副统帅”团队为了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肃清反对力量，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大批大规模的冤假错案，搞得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到了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发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通知，进一步造成了继“红五类”

红卫兵所掀起红色恐怖后，又一场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这一些近似疯狂的举动，不但为他们自掘了坟墓，也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种下了苦果。

不管是知情老干部故意泄露的，还是红卫兵运动中的少数探索者自己从各大图书馆历史资料中查获的，文革运动中部分对各种不合情理的现象和行为，认真分析，穷追不舍的学生，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刘少奇和薄一波等61人签下了“悔过书”，是因为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这是当时的党中央为了挽救这些不幸被捕的同志生命，聚集抗战的领导力量，满足当时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阀应付蒋介石中央政府的一种策略。当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时，当时的“党中央”这种出尔反尔，毫无诚信，为了政治斗争需要编造罪证的做法，在这些文革运动中的思想者群体中引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

这些难以令人置信的事实，动摇了他们以往的信仰和思维模式，使他们陷入了怀疑一切、否定之否定的思想混乱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这些消息的外传，使当时的党中央，中央文革，文革的副统帅，甚至毛泽东的信誉和威望大打折扣，“绝对正确”的信念产生了动摇。既然毛泽东是“神”，反了走在路上就会被打死，而且学生们对他还有期盼，寄希望于他来拨乱反正。在文革中其他老干部都可以反，为什么祸国殃民的中央文革就不能反？于是，在中央文革中首当其冲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了他们达到清君侧，使毛泽东远离小人的炮打目标。他们抓住了这三个人的历史问题，家庭问题和倒行逆施的卑劣行为，展开了前仆后继的炮打，促使中央文革日渐成了被人民群众所唾弃的对象。

第二个紧跟着所犯下的大错误，就是不该把人民群众当阿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忽视了被愚弄民众的强烈反弹。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当自认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曾经跟随着伟大领袖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感觉到受了愚弄和利用，而且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红卫兵运动和工人造反运动的精神控制，也就自动被瓦解了。利令智昏的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副统帅的团队，更不该在地方夺权斗争中操之过急，各怀鬼胎，拉一派，打一派，不择手段。他们不但为了私利，挑起了全国范围的武斗，提出了荒唐的“文攻武卫”口号，甚至提出“炮打军内一小撮”，把工人造反派的斗争目标引向了被毛泽东称为钢铁长城的最后一道防线，军队。

文革中被煽动起来的革命狂热和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愚忠是十分盲目的，力量巨大，破坏性也极大，与毛泽东口里所说的发扬人民民主的理性行为是完全两回子事。狂热的革命斗争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即能用来杀敌，也能自残。潘多拉盒子打开容易，再想把已经放出来的魔鬼收回盒子中去就难了。既然跟随着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大刀阔斧，无法无天，搞了残酷斗争，砸烂了公检法，踢开了各级党委，瘫痪了各级政府，那些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和响应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号召，起来造反，打倒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忙于扩充实力，抢班夺权的工人造反司令们，当然都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不会受到那些被他们打倒的干部东山再起时的残酷报复和秋后算帐。不争取得到个相当的职位和权力，甚至加官进爵，他们岂肯轻易退出政治舞台？面临成王败寇的社会现实，涉及下属成千上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组织成员，及其家庭的今后荣辱兴衰，生死存亡，这些造反领袖只有步步跟进，寸步不让，根本就没有退路可走。

从1967年3月7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革的规定（草案）”和同日《人民日报》“中小学生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到3月8日中央转发的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经验的批示，中央三申五令要求大专院校学生回校参加军训，中小学生复课闹革命，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大联合。但是，由于校革委会内的权力再分配，面临那些被他们打倒的干部可能被解放，结合进领导班子，紧跟而来的打击报复和秋后算帐的威胁，在各学校继续存在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央的指示根本就无法贯彻。被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的教师队伍，还是心有余悸，溃不成军。中央要求各地向所有学校派出工宣队，然而工宣队却无心与红卫兵

为敌，反而十分理解和同情学生造反派的处境，他们自己惦记着的还是回厂夺权。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由于被背弃，中央和中央文革对红卫兵运动已经完全失控，文革初期的那种绝对信任，一呼百应的现象再也不存在了。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和文革中的思想者已经从个人崇拜的迷失中走了出来。他们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对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宦官弄权”，一直困惑不解，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历史问题穷追不舍，抱着“否定之否定”，“怀疑一切”的态度，忧虑着祖国的前途和未来。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了毛泽东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操控文革走向全面胜利的阻力和打击对象。

拖到了半年后，1967年10月14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再次联名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发出了，关于已成了革委会的单位，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批示。然而，各校的红卫兵组织还是没有解散，复课还是不可能落实。直到1968年的春天，毛泽东决定派出军宣队，对所有大专院校和中学实行军事管制，才算从表面上勉强压制了下来。

再来说说中央文革和副统帅林彪团队在通过大联合，实现全面夺权过程中的拙劣表现。早在1967年1月22日，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发生后，中央就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夺权。3月17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了关于地方夺权的通知。然而，要在全国各省，市实现造反组织的大联合，展开全面夺权就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上海的工人造反运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一手操控下扶植起来的。有中央文革的张春桥为后台，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也不可能有任何造反组织有力量与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抗衡。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过程，只是一场有计划的全面接管，按剧本演出的大戏，没有任何阻力和挑战。而在其他省市，就有造反派组织山头林立，中央文革鞭长莫及等问题，存在一个先下手为强，地方势力、中央文革、林彪团队和原中央老干部势力，各方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展开的一系列缠斗，需要十分耐心和细致的协调，采取精明的策略才能达成目标。

然而，1967年7月20日，由于中央文革的王力在武汉，急功近利，轻率地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把一个具有百万之众的造反派，打成了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守派”。被打击的一派强烈不满，扣留了嚣张跋扈的王力，并对他的言行强烈谴责。王力的鲁莽行为引起了湖北两大造反组织的大规模对抗。受到王力支持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几次冲击武汉军区，试图夺取武器，遭到了守卫武汉军区的部队的抵抗。这就是所谓的“七二零事件”（注：当时本人和一批同学正好在武汉搞自费文革考察）。然而，江青和林彪却非但不检讨王力在工作中的鲁莽和轻率，反而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乘机排斥异己，硬是把武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把扣留过王力的造反派打成反动组织，并且谴责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在搞兵变，搞反革命暴乱。

1967年7月25日，林彪和江青在北京举行的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上，居然不顾就在不到半年前（同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通知，叫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号召造反群众冲击军事机关。7月27日，江青在河南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更是丧心病狂地提出了“文攻武卫”，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拿起武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同样是7月27日，林彪下令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并提出“彻底砸烂总政”。8月初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王力和关锋所写的“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文章。8月7日，完全站在中央文革一边，作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居然提出要“砸烂公（安）检（察院）法（院）”，号召群众冲击公、检、法。

他们的这一系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近似疯狂的行为，不但毁掉了文革以来已经扫除了所有的阻力和障碍，只等收获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好形势，还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造反派之间以“文攻武卫”为名的敌对武装冲突，甚至内战，使得文革的局势变得十分混乱和诡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完成全面夺权，成了遥遥无期。而且，他们还冲击到了毛泽东划定的底线——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迫使毛泽东对他们作出了严厉批评，要求“还我长城！”，并且决定对王力和关锋隔离审查。面对着即将要失控了的全国内战局势，毛泽东不得不出了应急的下策，派出军队到全国各省市县，实行了全面的军管。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已经基本破局，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都没有得到实现。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初所期待的，在文革中涌现的工人、农民和学生革命领袖大多数都不理想，或者在群众斗群众的混乱中，在不得不大量重新启用曾经被打倒干部和军宣队的排挤和打击下，和被中央文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中途夭折了，几乎是全军覆没。毛泽东原来指望由劳动人民出来说话，而且通过老、中、青三结合的方式，培养优秀的工农领袖来当家作主，取代那些已经蜕化，变质了的官僚的理想目标破产了，得到的却是由一批军队将领担任着各省、市、县的党和政府第一把手的军政府。毛泽东原来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后来却越搞越乱，“敌人”越抓越多，“信得过”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只剩下了孤家寡人，只有依赖侄儿，侄女作为亲信。

作为毛泽东能够直接指挥，冲锋陷阵的干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人数越搞越少。当初，打倒了原文革五人小组和参与其中的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在1966年5月8日中央发出的新文革小组名单中，有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加上后补的顾问陶铸，合计共有14人。没有等到运动展开就有王任重、刘志坚等5人落马。文革开展了才半年，陶铸不知趣，说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被打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因为武汉的“七二零事件”和鼓吹“打倒军内一小撮”，王力、关锋，随后戚本禹先后被隔离审查。为了设不设国家主席，争当接班人问题，陈伯达被卷入其中下台。作为中央文革的顾问，恶贯满盈的康生也不再被看重，在政治舞台消失了。权势无比强大的中央文革，最后只剩下了抱成了一团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个人，加上从上海拖上去的造反司令王洪文，就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四人帮”。

“四人帮”的狐假虎威，嚣张跋扈，疯狗乱咬人，过分张牙舞爪，使他们到处树敌，民心全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危如卵累还不知死活。“四人帮”和林彪“副统帅”的团队为了争夺接班人的地位，矛盾激化，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更是致命的一击。清除了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后，在党中央紧随毛泽东的文革派更见凋零。由于过分偏激，加上内部倾轧，不能容人，他们把自己搞到势单力孤，大势已去。“四人帮”所谓的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实际上只是成了维护他们自己在文革中夺得的权位和既得利益的代名词和打击政敌的大棒。到了文革的后期，全国各地省、市、县的党和政府机关领导班子，虽然仍然高叫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但是从骨子里早已完成了全面的翻盘。文化大革命的这块招牌，只有靠着毛泽东的虎威坐镇和周恩来的忠心护盘才勉强维持。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文化大革命还怎么能够不失败？

□ 摘自《博讯》网站，2005年6月20日

~~~~~

## 【研究报告】

### “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二）

◇ “一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大分裂

到1967年1月，同全国大部分地区形势一样，“保守派”在重庆基本上已处于分崩离析之势，造反派组织占据了“文革”舞台。然而，“一月夺权”风暴，却又导致造反派的大分裂。使重庆的群众组织出现了新一轮重新组合。

重庆造反派（或称“八一五派”）在1966年12月初就已经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当时围绕对“一二·四”大会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对“惨案”发生后如何对待被怀疑为“烈士”的尸体等问题，就有过激烈争论。而在当时那种提倡斗争，反对宽容，强调“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提倡“痛打落水狗”的时代环境中，任何意见分歧都可能上升为“原则”冲突，再加上所谓“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之类问题夹杂其间，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在“一二·四”事件之后由少数群众组织负责人仓促建立起来的山城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也因为意见不能统一、得不到许多群众组织承认，1967年1月4日，由少数人以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名义召开的“纪念一二·四惨案一周月大会”，遭到重大八一五等组织抵制。此后，存在仅一个多月的这个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被重大八一五等组织“砸烂”。这样，在中央号召“大联合大夺权”的1967年1月里，重庆造反派（其他地方也大多如此）却出现了大分裂，以重大八一五为代表，形成造反派中得到部队支持、占主导地位的一派，而以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工人造反军（包括司令部、总部和一支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为代表，则形成与之对立的一派。

当时造反派在市中区人民小学内设立了“一二·四惨案联合调查团”，造反军总部黄廉、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等都是调查团核心组成员。后来因西师八三一的工作人员在内部造反，两次发起“炮轰”重大八一五总团的“右倾”，重大八一五人员全部撤出，调查团即为西师八三一、工人造反军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所控制。当一些组织发起对重大八一五总团“右倾”的批判后，反重大八一五“右倾”的这一派就以调查团驻地为联络站经常会商，因而一度被称为“联络站”派。这一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是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李方成。然而，重大八一五等组织为攻击“联络站”派，却选取该派中他们认为问题较大的两个代表人物：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黄廉和《红岩》作者罗广斌作为靶子，讥称这个“联络站”为“廉罗栈”（实际上黄廉当时多数时间在北京，基本上不在“联络站”）。

罗广斌问题，成为两派分歧的一个焦点。罗广斌、杨益言站在反对重大八一五“右倾”的一方，因小说《红岩》的影响而成为“联络站”一派的旗帜。而重大八一五、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等则认为罗广斌在“文革”前多次受到市委审查的“出狱”问题值得怀疑，在小说《红岩》创作中及改编电影中又与“文艺黑线”有说不清的关系，因而认定其在“文革”中的表现是有“野心”，是混入造反派中的“政治扒手”……

对重庆驻军的评价也是两派分歧的一个焦点。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兼重庆警备司令部）领导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已经与重大八一五总团建立起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而“联络站”一派则因五十四军主要负责人是原市委委员，与李井泉和“黑市委”有说不清的关系，因而怀疑重庆警备司令部是“黑司令部”……

“一月夺权”进一步激化了这两派的矛盾。

1967年1月21日晚上，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各地造反

派闻风而动，开始全面夺权。

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地方率先进行了夺权。最早是1月12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省、市党政机关大权。14日发出通告正式向全国宣布。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月16日，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立并发表夺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1月21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市党政大权，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早期的这些夺权，只有山西省和黑龙江省得到了中央承认。此后，中央又陆续承认了贵州省（1月底）、山东省（1月底）和上海市（2月初）的夺权。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夺权，因事起仓促，中央当时并无明确指示，因此各地就只好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各自按照报上宣传的先期夺权的样板采取的方式并尽量揣摩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意图进行夺权了。

重庆在1月21日晚听到《人民日报》社论广播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即向全市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倡议由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出面召集各造反派组织开一个联席会议讨论大联合大夺权问题，次日，在红卫兵司令部驻地少年宫召开了有37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了夺权行动方案。1月24日至26日，重庆造反派50多个群众组织，在按照毛泽东指示“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五十四军支持下，展开了向重庆市级党政机关夺权的统一行动，并组成了以五十四军代表为首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

参加酝酿、协商、建立革联会的群众组织有——

八一兵团

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

红岩机器厂八三一战斗团

重庆工人九八战斗团

四川煤炭系统革命工人造反兵团

重庆机械兵团八一五总团

重庆无产阶级造反工人二轻兵团

红化工造反团

重庆电力系统红色造反团

重庆红建工革命造反兵团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反修兵团总部

重庆红色造反者交通兵团

重庆市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江北区永红兵团

四川省重庆轮船公司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分团

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重庆公司八一五革命造反联络站

重庆红色运输工人造反兵团

重庆红工八一五革命造反司令部

长航重庆分公司红色海员革命造反团

重庆红农八一五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庆革命农民造反军总部

国营农场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

重庆市农业局红色革命造反团

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者联络站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红色造反总团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  
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重庆大中专院校指挥部  
重庆红色四清队员造反团总部  
公用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站  
邮电八一五红色通信兵团  
重庆机关红色造反联合总部  
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  
重庆司法革命造反战斗团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革命造反临时管理委员会  
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四川省工农兵业余文艺革命造反兵团重庆团  
重庆卫生系统八一五兵团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红色造反队  
《新重庆报》革命造反委员会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渝红色造反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渝联络站  
西安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渝联络站  
西安大中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驻渝联络站  
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渝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渝红色造反团

此外，还有正待按系统归口的：

重庆革命造反联合野战军总部  
重庆市教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庆市中等学校革命教职工红色造反团  
重庆市民办校革命教职工红色造反团  
重庆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  
重庆钢铁设计院红色造反团  
东方红红卫兵革命造反团  
重庆医学院儿科医院九一五战斗团  
重庆市人民交通公司革命职工造反团  
(见1967年2月8日《新重庆报》)

名单中的“《新重庆报》革命造反委员会”，在筹备夺权时的名称实际上是“重庆《新闻报道》红色造反者”。因原《重庆日报》于1967年1月1日被造反派强行停刊改出主要转发新华社电讯的《新闻报道》，直到革联会正式成立后的2月1日才更名为《新重庆报》。

这个名单中没有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和总部，而只署了“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江北区永红兵团”和“四川省重庆轮船公司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分团”这两个基层组织的名字。实际上造反军司令部和总部都参加了筹建革联会和夺权的前期活动。据重大八一五事后记叙，造反军总部负责人叶祖禄参加了在少年宫研究夺权方案的联席会，还在会上发表了“我们工人抓革命促生产，没有时间来夺权，这个交给你们十二所大专院校”的意见，当时曾受到批评（重大八一五战斗团58423部队《夺权经过》，1967年2月17日）。另据八一五派记者记叙，工人造反军司令部负责人蒋国志也参加了革联会的筹备，并在1月31日的协商



筹备会上代表造反军司令部作了坚决支持成立革联会的发言（《新重庆报》红色造反者鲁迅战斗队、红岩战斗队，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红色造反队，新华社重庆记者站“只把春来报”战斗者《革联会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1967年2月21日）。后来的反到底领导成员、参与了革联会筹建工作的二轻兵团负责人夏祥贵则回忆，名单上没有工人造反军，是因为造反军司令部与造反军总部在署名上发生争执，都想由自己一方代表造反军，互不相让，后来就干脆都没有署名。

据重大八一五战斗团58423部队《夺权经过》一文记载，1月25日夺市人委权时被推举参加查封看管市人委印章的五个群众组织中，有工人造反军总部、二七战斗团总部、红色农民八一五造反司令部、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全国工农兵红卫军荣复转业军人革命造反军重庆总部，这都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全市性大组织，但后面这个组织很快就因中央明令取缔全国性群众组织和不允许荣、复、退、转军人单独成立组织而被迫退出重庆“文革”舞台。

在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中，真正起作用的实际上只是几个较大的组织。1月26日，42个群众组织在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开会商讨夺权后如何掌权事宜，决定：由工人造反军总部、红农八一五、退伍军人造反军、财贸八一五、重庆地区军事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组成七人监管小组管理市人委；市委宣传部由中学生红卫兵、六中32111战斗团、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教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体委八一五、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共管；市委办公厅、市监委、市委组织部由教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解放军、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监管；市委财贸政治部由财贸八一五、财贸九二一监管；市委工交政治部由八一五野战军、二七战斗团、二轻兵团、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监管；市农林局、农工部由红农八一五、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战斗团监管；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由八一兵团监管；市邮电局由邮电八一五监管……

在夺权中，造反派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一些本已参加夺权的群众组织（如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总部）又中途退出。2月1日，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50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名向中央发出急电，称重大八一五等组织在驻军支持下进行的“一·二四夺权”是“假夺权”。这个《急电》，由工人造反军司令部《造反军报》编辑王洪泰（重庆市糖果糕点公司干部）起草。给中央发《急电》的组织有——

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  
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司令部  
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一支队  
重庆工人二七革命造反委员会  
重庆二七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重庆市革命职工造反团总部  
二轻兵团  
革命洪流红色工人八一五战斗团总团  
山城八一五印刷工人战斗团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红卫军八二九兵团  
重庆革命工人暴风造反团  
重庆财贸工人九二一战斗团  
重庆“一二·四”惨案联合调查团  
四川煤矿系统革命工人造反团  
中梁山煤矿八一五战斗团  
江北煤矿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第一司令部  
松藻煤矿红色造反团

重庆市自来水公司东方红造反团  
重庆八四五厂八二八造反团  
重庆人民交通红旗八二九战斗队  
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  
重庆市税务局市中区分局红色警卫队  
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  
重医红卫兵团驻市委联络站  
四川外语学院“天安门”  
重庆六中32111战斗团部分战士  
重庆六中东方红战斗队  
重庆六中红色敢死队  
重庆六中毛泽东思想捍卫者战斗纵队  
重庆市五十中九三革命造反队  
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  
首都一司驻渝联络总站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联络站  
新北大驻渝革命造反者  
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渝联络站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渝联络站  
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渝联络站  
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驻渝联络站  
重庆市矿渣水泥厂八三一红色尖兵战斗队  
十八冶红岩战斗团  
重染八一五战斗团  
重庆革命职工造反团工农分部  
二七革委会嘉陵江分团  
重庆红卫八一五战斗团  
重庆河运校航锋战斗团  
重庆河运校红工战斗团三游击队  
重庆河运校东风战斗队  
重庆东方红电力校东方红战斗团  
重师附中“红卫兵”  
井冈山野战军川大纵队赴渝小队  
重庆三中“六七”造反团  
重庆东风船厂、北京人大、师大、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联合战斗队  
外地师生红色造反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技术学院赴渝人员  
(见1967年2月9日《首都红卫兵报·重庆版》)

在《急电》上签名的组织中，二轻兵团即前一个筹建革联会的名单中的“重庆无产阶级造反工人二轻兵团”，但其主要负责人夏祥贵这时正在北京，不了解此事，这个签名并不代表二轻兵团总部的态度，二轻兵团后来仍然是革联会成员单位；这个名单上有的不同组织其实就是两个人在代表，如“重庆市革命职工造反团总部”和“重庆市税务局市中区分局红色警卫队”，就是罗光远在代表，他既是税务局红色警卫队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又是职工造反团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名单中的重庆工人二七革命造反委员会，据二七战斗团总部主编的《二七战报》创刊号（1967年1月30日出版）文章称，是已被二七总部开除的“政治扒手”刘红在另立“司令部”不成后又另外打出的招牌；这个名单中有的组织虽然名称显得小，如“重庆市文联红卫

兵战斗组”，但影响力却不可低估，因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就是《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这个名单中有的组织的签名遭到该组织否认。如，2月3日，六中32111战斗团发表《严正声明》，称该团事先并不知道要开此会，会议进行两天后才得到通知派去两人参加，并不了解会议宗旨和前后情况，因此在《急电》上的签字作废。并称在《急电》上签名的该校东方红战斗纵队红色敢死队、川外天安门公社等是“托派组织”、“托派分子”（载2月9日六中32111战斗团《红卫兵》报第14期）。

2月4日，由西师八三一发起，在罗广斌、杨益言支持下创办的《新山城》报在重庆市文联创刊。作为“联络站”一派报纸，准备与革联会的《新重庆报》（即原《重庆日报》改名）对抗。但只出版了创刊号这一期即夭折。次日罗广斌即被八一五派从文联家中绑架，2月10日在关押地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跳楼自杀。

2月8日，“一·二四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五十四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常委12人（以后增加到21人），除军队代表二人（五十四军刘润泉与重庆军分区马骏容）和革命领导干部一人（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徐正身）外，其他名额分配给以下群众组织——

工人4人：八一兵团（阳增泰），二七战斗团（王庭学），重庆工人九八战斗团（陈万明），红岩八三一战斗团（不详），农民2人：红农八一五（赵行贵），革命农民造反军（艾启贵），财贸系统1人：财贸八一五战斗团（王绍川），文教卫生系统1人：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谭柏树），革命师生代表1人：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熊代富）。

这些进入革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大多是该组织的负责人，只有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谭柏树（重庆市曲艺团演奏员，共青团员）不是文艺界司令部负责人而只是其基层组织重庆市曲艺团轻骑兵的负责人。从这个革联会常委名额分配方案，可以大致了解到当时在“八一五派”中起主导作用的有哪些群众组织。不过，其中有的组织实际作用并不大，只是为了体现代表性而不得不安排的（如两个农民造反组织的代表）。工人组织中的红岩机器厂红岩八三一战斗团，作为一个基层组织能单独分配到一个常委名额，则是因为该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成绩显著，得到了新华社报道并在《人民日报》等大报刊登，成为八一五派引为骄傲，经常拿出来展示的代表。

在夺权前后这一阶段，因为党政领导机关均已瘫痪、半瘫痪，社会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因而成了群众组织的发展最为热闹也最为混乱的时期。满街红袖章，到处是战斗团、司令部。大的群众组织可以号称有数十万甚至百万之众（实际数字该组织负责人也不可能清楚），小的组织则可以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重庆市曲艺团著名评书艺术家徐勍，就曾独自成立了一个星火战斗队。当时新华社重庆记者站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新闻尖兵夺权后，几乎全记者站都是反对革联会的观点，然而有一个记者袁光厚却独自站到了支持革联会一边，他没有成立什么战斗队，而以“只把春来报战斗者”名义对外发表文章。

#### ◇ 造反、夺权期间的外地赴渝红卫兵

谈到1966年底到1967年初造反、夺权期间的重庆“文革”，不能不提到一些外地来重庆的红卫兵组织，因为他们对重庆的“文革”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特别是北京的红卫兵。当时最活跃的有：

首都一司驻渝联络总站，主要负责人孟宪成（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生）、钟东（清华大学学生）等；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主要负责人刘连仲（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张金根（北京政法

学院学生)、冯迈(北京广播学院学生)等。

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西师八三一、工人造反军这一方,认定重大八一五“右”了、“修”了。

另有少数三司人员在重庆以首都三司驻渝红色联络站名义支持重大八一五和革联会,但后来被首都三司开除。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渝联络站,主要负责人李云生。作为首都三司发起单位的成员,他们自然是跟三司、一司驻渝联络总站同一观点的。他们当时在重庆还进行了一件不事张扬的重要工作——把“文革”前受到李井泉打击迫害的“萧、李、廖”这个有名的“反党集团”冤案成员分别从拘禁地找到,接到该联络站在重庆的驻地(市政协)保护起来,并在这些干部上京告状时安排他们在地质学院住下,让他们集中提供“揭发李井泉”的材料,并着手为他们的冤案翻案。在罗广斌身亡并被八一五派当作“叛徒”展开批判之后,他们又积极参与了为罗广斌鸣冤、翻案的活动。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主要负责人是王纪文、周凯等几位北航研究生。他们坚决站在重大八一五一方。在1月底,正是由他们率先发起了“打倒罗广斌”的宣传攻势。

可以看出,在重庆的“文革”舞台上,首都红卫兵的“天派”与“地派”已经在一些问题上有了较明显的分歧。

在重庆造反派形成初期较有影响的,还有一个清华大学学生董九三,他对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走上造反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许多中学生红卫兵视为他们的“司令”,而被重庆市委视作眼中钉,千方百计将其逼走。

当时较有影响的,还有北京大学的朱学文、侯均初(历史学家侯外庐之女)、李景屏、韩敏中等四个女学生,她们到重庆是慕小说《红岩》之名而来,到重庆后一直在市文联帮助罗广斌、杨益言造反。但是她们都“出身不好”,因而既不是“新北大公社”成员,也没有打出什么组织旗号。

另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渝联络站(先以“哈军工鬼见愁”之名到重庆串连,后得到总团认可作为驻渝联络站),当时在重庆也有较大影响,主要负责人周闯(海军系六五级学生)、毛琦(女,空军系六五级学生)。值得一提的是,周闯是西师八三一负责人周荣之弟,却在“一四”大会上宣布支持重大八一五,在革联会成立后坚决支持革联会。兄弟俩分成了两派。

#### ◇ 造反、夺权期间的群众组织小报

“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小报,只是相对于官方出版的“党报”而言,其实有的小报并不小,与官方大报是一样的篇幅甚至版面更多。

重庆“文革”中创办最早的群众组织小报,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红卫兵报》(1966年10月18日创刊),但因其属于“官办”,“官样文章”多,读来乏味,没多大影响。

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造反、夺权期间,重庆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张贴大字报、印发传单之外,为加强舆论宣传,又纷纷办起了自己的小报。其中较有影响的有: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山城红卫兵》报（1966年11月5日创刊）；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815战报》（1966年12月9日创刊）；  
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的《红岩》报（创刊期不详）；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八一八战斗团的《八一八战报》（1966年12月26日创刊）；  
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的《中学生红卫兵》报（1967年1月1日创刊）；  
工人造反军（总部）的《造反军战报》（1967年1月16日创刊）；  
工人造反军司令部的《造反军报》（创刊期不详）；  
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的《二七战报》（1967年1月30日创刊）；  
重庆财贸工人九二一战斗团的《九二一炮声》报（创刊期不详）；  
二轻兵团的《二轻兵团》报（1967年2月9日创刊）；  
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的《鲁迅战报》（1967年2月9日创刊）……

当时有的单位有两派组织的，各派都办了自己的小报，如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一〇五红色造反团、红工造反团有《一〇五风暴》（1967年2月1日创刊），七医大红色造反总团则有《红色造反者》（1967年3月4日创刊）。

外地赴渝师生的联络站也办了一些“重庆版”小报，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渝联络站的《东方红》报重庆版（1967年1月28日创刊），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的《红旗》报重庆版（创刊期不详）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首都三司的《首都红卫兵》报重庆版（1967年2月9日创刊），反革联会一派给中央的《急电》（被八一五派称为“黑电文”，就是在这份小报创刊号上公开发表而造成影响的。

#### ◇ “镇反”与群众组织的重新组合

“一月夺权”并未带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面貌，反而导致社会大动乱和生产急剧下降，这必然使长期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毛泽东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因此从1月28日颁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八条）到一系列报刊社论文章中频繁出现了“镇压反革命”的提法。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时称“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镇反”的信号。其中第四条针对当时全社会风起云涌的群众组织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里所提出的对一大批各种类型“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明令将那些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的人清除出群众组织并剥夺其“大民主”权利直至“依法惩办”。其打击面之广，堪称“史无前例”。

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这实际上是发出了开展“镇反运动”的号召。

次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1967年第三期《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更以大量篇幅谈到“镇反”问题，明确指出：“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2月4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提出“对打入革命群众组织、篡夺领导权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党，必须立即逮捕法办。”“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所有群众组织及其行为”，等等。

同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中央文革小组这个“二四批示”，率先在湖南掀起了针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反运动”。

2月16日，新华社播发《决不容许把斗争矛头指向英雄的解放军和真正的革命右派/福建革命力量粉碎了反革命逆流》的新闻电讯；17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18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拼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这些重要社论及报道，均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送，这些杀气腾腾的语句人们大多耳熟能详，深入人心。在这样强有力的“战略部署”和舆论导向下，“镇压反革命运动”便在全国许多地区先后开展起来了。

因为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最初的“镇反”是得到各群众组织拥护和支持的。2月初，重庆市公安局临委会与工人造反军总部联系研究后，得到造反军总部同意，决定对前哨街（即临江门，“破四旧”时改名）的造反军前哨支队中一人以“现行反革命”罪进行处理。2月7日出动部队包围前哨支队将其逮捕。

从1967年2月下旬开始，“镇反”掀起高潮，重庆的群众组织经历了新一轮重新组合。反革联会一派的许多群众组织相继被五十四军、革联会或八一五派以“反对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右派组织”、“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大批群众被逮捕、拘留、揪斗或“勒令”自首、请罪。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工人造反军的前哨支队、六号门纵队等被作为“反动组织”明令取缔，其负责人及骨干成员被召开公审大会逮捕并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新重庆报》作了重点报道。在“镇反”中，一些八一五派的群众组织（如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行使了专政机关的职能。

3月7日，北碚区驻军宣布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是“右派组织”，勒令解散。次日，西师八三一负责人周荣等7人被八一五派北碚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拘捕。

3月9日，五十四军对后字242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实行戒严，宣布取缔该院反革联会的红色造反者总团，先后拘捕其负责人及骨干成员30多人，同时抓走驻该学院的

其他反革联会红卫兵 29 人。

3 月 10 日，革联会建立的重庆交通学院联合夺权指挥部发布《公告》，宣告砸烂该学院反革联会的九一五战斗团团部。交院九一五负责人 8 人被拘捕。

3 月 11 日，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告》，宣布开除反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并对参与反革联会活动的重庆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战斗团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此后，后字 242 部队红总、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就被八一五派称为“三大右派组织”。

曾经参与组建革联会的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也站到了反革联会立场上，宣布退出了革联会，2 月下旬，重师附中中学生红卫兵、石油校八一五战斗团、红岩二中红卫兵团等造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反，成立了中学生红卫兵红色造反临时联合委员会（红联会），发出《紧急联合声明》，宣布原中学生红卫兵总部退出革联会的所谓《严正声明》对他们无效，并申请加入革联会。重庆第一个全市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一度在重庆“文革”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就此解体。

国防工业系统继八一兵团之后成立的另一造反组织军工造反兵团，因为遭到八一兵团的排斥，在参加革联会成立大会时被八一兵团撕毁旗帜，发生冲突。此后也站到了反革联会立场上，在“镇反”中整个组织被勒令解散，负责人和骨干成员遭到批斗和强迫请罪。

参与筹建革联会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反修兵团（简称反修兵团），是以合同工、临时工为主的跨行业群众组织，在“镇反”中也被当作“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反动组织摧毁……

在 1967 年 4 月“镇反”遭到否定后。据革联会调查研究小组《向山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汇报（修改稿）》（1967 年 4 月 17 日）中披露：文革中，“我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四百多个革命组织，近二百万人，其中一千人以上的较大组织七十九个，属于跨行业、跨地区的三十五个。”革联会成立后，要求各组织实行“归口大联合”，“据对市属五百零六个单位的调查，截至三月底已实现大联合的二百六十四个”，“正在准备大联合的一百一十四个”，“暂时联合不起来的一百二十八个”。在“镇反”中，“从二月下旬到四月上旬，全市共取缔反动组织二十四个，非法组织一个。”另据八一五派的重庆市公安局革委会统计，全市从 2 月 24 日到 3 月 17 日止，由公安局明令取缔的“反动组织”36 个，由群众出面砸掉的 82 个，自行解散的 146 个。（《重庆二、三月“镇反运动”大事记》，载重庆反到底公安红一方面军《公安反到底》8、9 期合刊，1968 年 3 月 20 日出版）

后来反到底派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在《向山城革命群众揭露重庆市二、三月“镇反运动”的情况》中有另一个数字：“在‘镇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取缔和整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共七百六十二个（分布在四百多个基层单位，大多数是工厂的）。”重庆市綦江县“全县一百几十个造反组织几乎被全部整垮。另一方面，却扶植了一百零七个已经垮台的保守组织。”（《公安反到底》第七期，1968 年 2 月 26 日）

不过，反革联会一派的部分群众组织在“镇反”中被压垮，并不等于群众组织数量的减少。因为，当时已经形成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被全面夺权的形势，除军事管制以外的各部门各单位，基本上都由群众组织控制局面并主持日常生产、工作。任何一个单位，当其造反派组织被压垮后，必有另一个得到军队或革联会扶持的群众组织出来取代其地位。比如，在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被压垮后，取代它的有革联会支持的春雷造反兵团；在后字 242 部队（解放军

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红色造反者总团)被压垮后，取代它的有革联会支持的“文筹”(文革筹备委员会)；在綦江县松藻矿区工人造反军打通战斗团于3月2日被压垮后，取代它的是革联会扶植起来并以当天日期命名的“三二战斗团”；在重庆灯泡厂八二八战斗团于3月13日被作为“反动组织”取缔后，取代它的是革联会扶植起来并以当天日期命名的三一三战斗团；在重庆市文联，当罗广斌被八一五派抓走并在关押地自杀身亡，杨益言逃往北京告状后，以罗、杨为首的红卫兵战斗组和文联文革小组被压垮，而由工农兵文艺兵团(以一些工厂、机关的业余文学作者和业余文艺活动骨干为主组成，全称为四川省工农兵业余文艺革命造反兵团重庆团)驻文联再次夺权(向以罗、杨为代表的造反派夺权)，革联会和重大八一五还在文联机关扶植起另一个坚决反对罗、杨造反派的尖兵战斗组。

因此，尽管在“镇反”中有相当一批群众组织被压垮，但群众组织特别是基层单位中的群众组织，数量并未减少，某些地方甚至还有所增加。

真正减少了数量的，是一些跨行业跨地区的较大组织。2月27日，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公开报道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搞联合的经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244页)，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有关报道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向全国推广贵阳棉纺厂自下而上地按车间、部门实现“归口大联合”的经验。3月16日，重庆纺织系统八一五派组织率先仿效，“归口”成立“重庆纺织兵团”。与此同时，一些跨行业组织在“归口大联合”的形势下宣告撤销，回本单位参加“归口”。3月20日，重庆革联会发出关于按单位、按部门实行归口大联合的通知。大势所趋，连大名鼎鼎的八一兵团总部也在“归口”声浪中一度撤销……

在此期间，群众组织的小报也大多停办。3月14日，八一五派联合创办的《山城战报》创刊号出版，并在《告读者》中称：因重庆目前各革命群众组织小报太多，已给印刷工作和纸张供应造成困难，为保证毛主席著作的正常印刷和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自即日起各革命群众组织小报除《山城红卫兵》外一律停办，并联合创办《山城战报》。从3月22日出版的第三期起，《山城战报》改为由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宣传委员会主办——从群众组织小报变成了“官办”小报。

#### ◇ “红五条”前后两大派再次重新组合

但是，从4月初掀起的“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风暴，打断了这个试图“规范”群众组织的尝试。群众组织又面临一轮新的重组和发展。

各地愈演愈烈的“镇反”，显然已超出毛泽东最初的意图，严重偏离了其“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已经在许多地方处于“收尾”状态，面临夭折的危险，毛泽东不得不调整了部署，并把前一阶段的“镇反”与所谓“二月逆流”联系起来，把责任推到了谭震林、叶剑英等人及各地“支左”部队负责人的身上。

4月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中加写：“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中共中央当天下发了这个决定，其中明确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将于次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表明了否定前一阶段“镇反运动”的明确态度。

就在这天，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22期发表由首都三司、一司、北地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赴渝联络站和北大赴渝战斗队联合供稿的《妖雾弥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向中央文革、首都人民汇报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称八一五派夺权是“和平过渡”、“改良主义”，革联会是“反革命的三结合”，革联会变本加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为了否定前一阶段的“镇反”，把群众再次发动起来，毛泽东又一手导演了“文革”中的第二次大规模平反运动，前一次是为被工作组和党委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这一次则是为被各地“支左”部队和公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并关进了监狱的群众平反。前一次平反浪潮导致了各级党委的瘫痪，这一次平反浪潮则导致了“砸烂公检法”和“揪军内一小撮”的野火燃遍全国……

4月3日，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恢复活动。这是被“镇反”压垮的反革联会一派群众组织开始恢复的重要信号。

4月7日至8日。革联会召开“炮轰大会”。欢迎各群众组织炮轰革联会的错误，声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二轻兵团负责人夏祥贵在发言中提出：“革联会是我们把它扶起来的，可是现在它却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我们大家一道起来把它砸烂吧！”率先提出了“砸烂革联会”的口号。

4月11日，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形势辩论大会。由司令部常委邹雨林传达了革联会“炮轰大会”情况。一些文艺单位的群众组织纷纷发言指责司令部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没有站稳立场，没有为基层受到打击、压制的群众组织说话。会后，要求“砸烂革联会”的群众艺术馆东方红战斗队等一批组织拉出队伍，成立了重庆文艺界红一方面军，负责人是原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中的邹雨林、田惠珍及邓重光（重庆市电影公司技术人员）。此后，文艺界红一方面军又与杂技团延安纵队等组织联合成立了文艺界延安兵团。

4月13日，革联会召开各造反组织（自然只限于八一五派）群众大会，对一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群众组织进行公开平反。此后被捕群众陆续获释。反革联会一派重新聚集队伍，因其“砸烂革联会”的一致立场而被称作“砸派”（后于7月中旬改称为“反到底派”）；革联会一派仍称“八一五派”。

从4月下旬开始，“砸派”队伍迅速壮大。

原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解体后，这时一些骨干成员重组了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九一”是纪念一年前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的日子），主要负责人刘先裕（原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负责人）、王木全（第九中学学生）。

原八一五派中一些群众分化出来，投向“砸派”一方，如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战斗团、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战斗团等，几乎是“成建制”地转到“砸派”一方（有少数人拉出队伍另打旗号留在八一五派中，如西南政法学院紧跟毛主席战斗团、西农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川外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一些原来只有八一五派组织的单位，如重庆市公安局、第一中学、第六中学、第二十九中学等，也分化出了加入“砸派”的“红一方面军”，各中学的红一方面军还组成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革联会机关报《新重庆报》中的九一四纵队于4月2

6日宣布加入“砸烂革联会”行列，主要负责人有沈世鸣（女，原重庆日报编委、报道组组长，中共党员），张怀真（原重庆日报工业部编辑，中共党员）；财贸八一五战斗团中分化出的一些成员，与财贸九二一战斗团共同组成了财贸井冈山总部，主要负责人有甘廷荣（财贸九二一负责人）、汪永强（财贸九二一负责人）、刘焕中（财贸九二一负责人）、吴宪尧（重庆市财税局干部）、沈旭容（女，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会计处干部）、雷光荣（红卫食品厂工人，劳动模范）等。

原来几乎是八一五派八一兵团“一统天下”的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也在“镇反”中被压垮的军工造反兵团的基础上，联合从八一兵团中分化出来的人员，组织起了反到底派最大最强的工人群众组织军工井冈山总部（5月21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有李木森（江陵机器厂助理技术员，共青团员）、邓长春（望江机器厂工人，共青团员）、周应古（建设机床厂工人）、李桂芝（女，长安机器厂工人）、刘锡邦（长江电工厂助理技术员）等。

5月16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条”或“中央五条”），决定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意见》既肯定重庆驻军在“支左”中有成绩，又承认他们“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求“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意见》对造反派两大派矛盾的焦点革联会采取了回避态度，既未予以承认，又让支持革联会的五十四军领导（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担任革筹组领导。

毛泽东发布这五条意见，原本以为可以平息重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纷争，认两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这个“敌”就是前中共重庆市委，新的名称是“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然而，事与愿违，“红五条”反而使两大派矛盾更加激化。5月16日深夜，“红五条”传到重庆，重庆马上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

5月17日，砸派在市内举行拥护“红五条”和“欢呼革联会寿终正寝”的盛大集会游行。

5月18日，八一五派在市内举行“誓死保卫革联会”的示威游行，对“红五条”未承认革联会公开表示不满和抗议……

这两天的大游行，实际上成为两大派在展开全面内战前夕对各自力量的一次大检阅。

此后，在五十四军领导人的苦心劝说、开导下，八一五派认清形势，改变了态度，明白了“方糖甜，圆糖也甜，砸派有个铲铲权”（革联会、革筹组只是“方糖”与“圆糖”一样的形式变更，都是支持八一五的五十四军领导掌权，砸派啥甜头也尝不到。“铲铲”系川语，即空白、一无所有之意），重新举行了拥护“红五条”的游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八一五派与砸派的分歧就此消除了，路线之争日益演变为利益之争，八一五派与砸派两大派在辩论、宣传中从动口到动手，以“武器的批判”代替“精神的批判”，开始了逐步升级的大规模武斗。

~~~~~

## 【难忘岁月】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七）

• 刘文忠 •

## “神权”高一切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我出狱回厂管制的一九六九年春天，全党全国正在热烈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迎九大，献忠心”新高潮，“造神”运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端，大大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超过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权。毛的“神权”高于一切，全国人民顶礼膜拜，作为“牛鬼蛇神”的我们，更是吃尽了“神权”专横残忍、横扫一切的痛楚。

记得关押在一所302室期间，有位11座程古魁，上海美院的一位大学生，出身不好，有位哥哥在台湾，属反革命逃台家属。他是个有艺术才华的年轻画家，专攻雕塑艺术。他有位漂亮的女朋友同学，同班情敌看准他出身不好软档，模仿他笔迹书写了一条反动标语塞在他课桌里，结果作“反现”处理。卑鄙的同学进一步落井下石，揭发他不少所谓的“反动思想”言行，说他对文革不满，对抄家不满，对“成份论”不满，还说有次在四川刘文彩地主庄园制作地主剥削农民的雕像时，他收工吃饭时把泥刀插在雕塑的贫下中农心窝位子上，可见他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更严重的反动行为是，他画的一幅毛主席侧面油画肖像，仅见一只右耳朵，恶毒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反驳说：“那是主席侧面画像。”批斗人严厉责问他：“你为什么不画左侧面，非要留下右边的耳朵？”“这……”他对如此强词夺理、不懂艺术的荒唐问题不屑一辩。可是“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是“吃素”的，联系他出身问题，家里又有右派，可见对左的极端仇恨。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全中国革命左派的领袖，亿万造反大军的伟大舵手，你偏偏留下右耳朵，岂不是隐喻毛主席应该用右耳朵听话，多么恶毒啊！是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为。于是他被抓捕进第一看守所。

按照11座青年画家的“罪行”，我与胡兄等在牢房中直言不讳攻击毛残害知识精英的倒行逆施，即使长十八个脑袋也被“神权”处决了！辉哥义无反顾地抗击毛的专横独裁，“神权”怎能容得他的生存。可是关在牢房反而能肆无忌惮地愤慨抒怀，出了监狱，原想可以自由一点，倒反被“神权”的无比强大专制威力所慑服，正是始料未及的可悲可笑。

我每天早上六点到厂，照例在专政队监督下打扫几只厕所，清除厂里成堆垃圾，忙得气喘不过来。刚刚打扫、清除完毕，已到八点钟，日班工人上班，我与全厂“牛鬼蛇神”一起，列队在厂门口毛主席巨幅画像前，低头请罪十分钟。这叫做“早请示”。一天正常的上班、接受监督劳动结束，晚上六时，工人们纷纷下班回家时，我们这批“牛鬼蛇神”又要列队在同一地方低头请罪，叫做“晚汇报”。在“早请示、晚汇报”这短短的两个十分钟内，由专政队监督组带领下，要我们朗读或背诵几段专门为教育“牛鬼蛇神”的毛主席语录。如：“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又如“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我们在跟着诵读或自己背诵时，一律低头眼睛朝地看，决不许张头转脑，东看西望，因为那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同时诵读、背诵的声调一律要响亮，一字一句念清楚，如果低声轻语、字句含糊，也是对毛主席的极大犯罪。读、背毛主席语录开始前，先向伟大领袖的画像三鞠躬。读、背完语录后，又要三鞠躬。鞠躬的规格也有标准，决不许点头似的轻浮举动，那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不敬与亵渎；也不准弯弯腰草草了事，更是“牛鬼”心中怨气冲天的疯狂反扑。凡轻浮点头者被监督人员频频揪头，草草弯腰者更遭背后几脚猛踢。确实，对“神权”的顶礼膜拜，非得虔诚笃行，稍有疏忽，恰是自讨苦吃。

“牛鬼蛇神”的“早请示、晚汇报”，犹如教徒的忏悔与祈祷，这种仪式诱发了人的“原罪意识”，使人们不断在检讨和揭发中，对人对己无情残害与诬陷，起码的人权早被剥夺了，成了失去了灵魂的低等动物。这时，这种仪式是在日班工人上下班进出厂门的高峰，也是大家簇拥

着观看热闹的时刻。专政队明确宣布，这二场厂门口的每天表演，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批示的“北京六厂二校”群众专政经验，不只为严肃教育“牛鬼蛇神”，更为了教育全厂广大群众。在全厂近二百名工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专政监督人员为了表现对“牛鬼蛇神”的刻骨仇恨，为了让大家受到深刻教育，所以在每次“早请示”或“晚汇报”时，总得从十多名牛鬼队里拉揪出一、二个来，或指责他们头低得不够要求，或是背诵语录的声音不够响亮，于是给予一阵凶斥、一顿体罚。监督组这样行动，完全是遵照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他们高呼一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挽头兜脑地向“牛鬼”打下来。他们又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进行批判”，我们中必有人被一把头发揪出来批斗，其余人识相陪斗。他们再念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我们中就有人后背给他们猛踢几脚，被打倒在地，并又被拉提脑袋，喝令“老实跪下”。跪下的“牛鬼”必须面对东方，因为东方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位“牛鬼”顺势跌下，跪向了西方，结果被专政队员又是一顿毒打，说他至今还梦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复辟！有一天，监督人员责令我们诵读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篇文章近二千字，不如一段“语录”念读背诵方便，所以我们口语难免疙疙瘩瘩，结果一个个都被凶狠的造反派打了嘴巴。观看的工人们，有些年岁大些的，一个个低头叹息，悄悄离走，而那些年青工人，尤其是造反派队员，个个手舞足蹈，眉开眼笑，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又振臂群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个年头中，全厂工人不仅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进出工厂大门都得高举红宝书向毛主席巨幅画像呼喊“毛主席万岁”。早晚班会结束要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上面规定“三忠于，四无限”，要深入人心，溶解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中午食堂开饭，工人们都得手持红宝书，向张贴在食堂门前的毛主席画像致礼，表示“吃饭不忘毛主席”。工厂内、车间里，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尺幅不等的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的红色标语，有的机器工作台和工具箱上也有毛主席语录。谁如果一不当心，稍有不慎，必造成天外飞来的无妄之灾。厂里有位陈师傅，早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自然成了“牛鬼”，遭专政的对象，“革命群众”揭发他污蔑反右斗争扩大化，又检举他攻击大跃进，三日两头遭批斗。有一天，一个与他合用工具箱的人，揭发他竟把换下来臭汗淋漓的工作衣裤扔压在毛主席语录上面，外加还有一双臭袜子。这下子陈师傅“吃不了兜了走”，成了恶毒污蔑、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可怜的这位1米75高个子早被折磨得剩下85斤瘦骨嶙峋的老师傅，被造反派一次次残酷批斗，肆意抽打耳光，双脸红肿了很多日子。

话说得回来，对毛“神权”的忠贞不二、毫不动摇，不只限于牛鬼蛇神，不管是谁，胆敢侵犯“神权”，都必遭到“严惩”，连造反派头头也不例外。有个姓王的青年工人，昔日是全厂最瞧不起的小混混，拍马奉承，吊儿郎当。“文革”一来，他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头头。他小人得志、神气活现、不可一世，把过去受人奚落的怒气全出在当今倒霉的“牛鬼蛇神”头上。每次批斗会，这个王造反最来劲，别人想不出的邪恶凌辱手段，他却想得出来。他曾出一绝招，说为了使外来参观厂的客人们区分清楚厂里的好人与坏人，“七类分子”一律别上标志，上面分别写明“反革命、地主、富农、右派、特务、流氓、走资派”，像当年法西斯纳粹集中营关押犹太人一样。可笑的是恶人自有恶报。有一次在车间小组批斗会上，这家伙得意忘形，上窜下跳，一会儿站起来搥别人的头，一会儿坐下来读语录。他忘了刚刚站起来把语录放在椅子上，一屁股坐下去，再站起来屁股一扭把性命交关的红宝书弄到地上，又一脚踩上去，他还浑然不知。这时大家“雪亮的目光”一下子从“牛鬼”身上转到了他身上。当他猛然发觉，慌忙提腿避让，脚下一滑，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封面已被他踩破了！他顿时傻了眼，脚骨都发抖了，他清楚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比批斗的牛鬼们罪行还重。说时迟那时快，冲上几个他手下的造反积极分子，把他按牢，叫他不许动，保持“现反”现场，火速叫厂革会头头到场认定罪证确实，马上批斗。于是我们这批挨斗的“牛鬼”撤下阵来休息，而这个狐假虎威、张牙舞爪的造反派头头眨眼间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这天我们“牛棚”内大家乐坏了嘴，除了免除了一场

残忍批斗，胃口大增，午饭滋味极美。老陈师傅说得好：“老天有眼，恶有恶报。”王造反当天也被关进“牛棚”，被我们奚落、臭骂一顿。后来他向厂革会头头求情，提出调到外厂去接受审讯调查。

### 监外更大监

在工厂里，我是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管制分子，是各类“牛鬼蛇神”中最年青、最反动、性质最严重的一个。所以每次厂内大小批斗会我是不可缺少的靶子。尤其在刚回工厂，所谓落实“六厂二校”群众专政经验的新高潮中，我被专政监督组人员押着，从早上冲床车间早班学习开始，由一个车间转到一个车间，又到后勤组，办公室轮流批斗，直到装配车间晚上八点结束，每天要被揪斗四、五场。用厂革会头头话说：“对这个管制三年的反革命分子，触及灵魂时间也要最长最深刻。”厂里最重最脏最苦最危险的活必有我在干，我也是“牛鬼蛇神劳改队”中的主力军。后来批斗会少了些，我八小时被监督劳动之外，负责打扫厂区最肮脏的男厕所，又有裁料车间、冲床车间早晚二班的废料归我清理。这二个车间的清洁卫生，包括厂里唯一的男浴室都要我打扫。我每天早上六点到厂，赶在早班工人开工前搬料，并要清理晚班工人留下的废料，晚上工人们下班我则要打扫厕所等忙到七点才能完工。如果碰到白天批斗，我必须加班干到晚上八点甚至九点才能回家。

我在单位拼命干活，用此来麻木自己痛苦的灵魂。我放弃了一切节假日，每天天不亮逃出自己居住的里弄，晚上街灯齐亮后悄悄回家。我真像见不得光的“鬼”，想逃避见到从小玩耍、留有美好记忆的村前屋后，怕见到一切熟人、同学、朋友、邻居，我甘愿一个人在单位忍受各种非人的凌辱、残忍的批斗。厂内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差唤我这个“牛鬼”。开始想总比被关押在监狱里自由一点，并想以此取得尚留一点良心的人们的同情，争取减轻一点人格侮辱与肉体摧残。然而，我还是个不知社会深浅的青年人，我的幻想落空了。

那天，一个造反派队里的女煞星，姓张，大家背后都称她“破鞋”，借故打扫女厕所的女牛鬼生病请假，非要我去打扫。我忍气吞声，默默地去打扫清洁出来。突然，她进厕所出来，有意找茬说我“没有打扫清”，逼我再进去打扫。我进去一看，发觉三四张血淋淋草纸抛散在地，胃里不由翻出恶心来。明明刚才我打扫得清清爽爽，完全是她上厕月经纸故意扔在地上恶作剧。她竟气势汹汹地逼令我“一张一张捡起来”。我人格上遭受极端侮辱，忍无可忍，双目射出仇恨的眼光，愤恨地盯着她，说了一句“下流，你不要逼我！”拿起扫把，转身离开了女厕所。谁知这个女煞星耍流氓手段，冲出女厕所大叫“非礼！非礼！”她跳跃式地奔进造反派监督组，指着自已弄乱的头发与上衣，一口咬定我在女厕所非礼她，并想行凶“杀她”。造反派不问青红皂白，冲进车间，用绳子把我绑捆起来，押到食堂里，通知各车间阶级斗争积极分子，临时紧急召开斗争“现行反革命行凶犯”大会。

被造反派反绑着双手的我，被冤枉而怒火填膺的我，头颅高昂，双目瞪着喷火。两个押架我的专政队员用手死命地揪着我的头，大叫大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忠！”现场批斗会上，那个泼妇“破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诉我在女厕所要非礼她，用扫把打她，并威胁要杀她。尽管全厂工人谁也不相信这一反革命事件，一则光天化日之下我这反革命分子没有条件干这种事，二则我的为人品质全厂都知道老实本分，虽然左脚残疾，但向来劳动勤奋、待人厚道。尽管大家当着我面人人喊声“打倒反革命”，但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会干这样荒唐事。更何况大家知道，这女造反派早是个作风腐化的“破鞋”，她现今的姘头是区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但在“女破鞋”的恶行恶状表演下，在厂造反派专政人员的肆意挑动下，当我遭受他们疯狂暴虐凌辱时，在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提一句疑问，更没有人肯帮一个反革命说一句公道话，因为都怕得罪这个女煞星。于是，我被他们五花大绑推跪在三角铁上，头颈上还给我吊上一块十几斤重的铁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行凶犯”。他们用皮带、木棒一边对我拷打，一边逼问我：“为什么用扫柄打

造反派头头，并骂头头‘下流’的话？”“为什么用仇恨的眼光看人？”并要坦白交代“‘不要逼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个造反派头头起劲叫喊：“这是他阶级报复，想杀人，想放火烧厂房！”据说最近我们手工业局系统确实发生过一件事，一个四类分子被拷打后报复放火烧了厂房，自己自杀。为此，他们马上把我同这件事情联系起来，拉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拼命地加大“斗争火力”。我却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同车间的一名女监督员上前揭发说：“我看到他早上和晚上经常在车间无人处打扫卫生时，一边打扫一边练身体，在车间门梁上拉单杠，又用三只凳子搁起来练腹部撑，一边练一边吃胡萝卜，嘴里还数十二、十三，好开心舒服，简直不像个改造管制分子。”

另一个女工接着揭发：“这个反革命每晚用冷水偷偷擦身，像幽灵一样躲在车间墙角落里，很怕人的。他身子壮得不得了，肌肉像运动员一样，不信你们扒开他衣服看。”在女煞星指挥下，几个人松开捆我的绳子，扒了我上衣，在场“革命群众”马上大呼小叫：“你们看看，这反革命分子身子练得多结实，浑身是肌肉。”

“这反革命雪白棍壮，比我们革命群众身体还保养得好。”有人又揭发说：“我看到他在食堂打饭，食量大得不得了，一顿饭吃八两。”马上又有人大声接腔道：“反革命凭什么长肌肉？想复辟！”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看守所关押近二年半，骨瘦如柴，常生病，所以我发誓一旦放出去，第一件就要锻炼身体。一个搞体育的牢友告诉我，“你19、20岁正是发育期，进了监狱发育不出来，只要不超过25岁有机会出去锻炼还来得及。”所以我出来后每天不管多劳累，总是坚持锻炼。在胡萝卜上市时我每天要买一面盆生吃。中晚饭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打饭，我不敢给造反派看到我胃口这么大，这么能吃。现今听来，我自己练身体、用自己饭票多吃一口饭也都成了“罪名”，我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世道中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无休止的揭发，无休止的污蔑，我像一个古罗马奴隶跪着，任凭宗教神权与奴隶主们的谩骂、毒打。造反派们怀着妒忌、邪恶的凶眼，用手拳、用木棒戳我胸肌腹肌，恨不得把我身上肌肉一块块刮割下来。突然，我头上冲撒下一盆奇臭恶心的水，浇得我浑身臭不可闻。后来才知是那女煞星从女厕所掏来的脏水。她又在我头上挂上一只塑料袋，里面放着她曾强迫我要捡起来的那些带血的月经纸。我满腔仇恨，顿时想爆发怒火，但想同这些丧失人性的两脚野兽抗争，无非遭受他们更大的疯狂凌辱。他们见我咬紧牙关，拒不回答一句话，便找来一块小木板，抓住我下巴，撬开我嘴，撬破了我的牙齿。我张开满嘴血淌的口大声叫道：“我只有一条命，你们送我进公安局！”他们反说我“嚣张”，又用皮带木棍毒打我。我双膝抵挡不住三角铁刺骨的坚硬，从剧痛到麻木，最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

造反派头头有人可能感到这件事确实冤枉了我，批斗了半天僵持不了，有些“革命群众”也声嘶力竭后上气不接下气了，所以想草草收场。这场残酷批斗结束前，他们对我勒令了几点：第一，以后看到我在工厂里练身体，见一次斗一次；第二，以后看人不准带一种仇恨眼光，不准像幽灵样在车间里乱串暗躲；第三要食堂革命群众监督、控制我饭量，不准我吃得太多，一顿饭只能买四两，不能超过革命群众生活标准。我心里想，本来我们“牛鬼”出同样的饭菜票，只能分得分量不足的锅巴饭或剩下的残菜冷羹；只有在所谓“吃忆苦饭”时，食堂造反派才开恩少有慷慨大度，给我们双份加倍的大麦与野菜煮成的饭团，并勒令牛鬼们通通吃光。从今以后，我上食堂打饭更要饱受无产阶级铁拳的专政了。

像这样无缘无故、飞来横祸的批斗，我不知经受了多少次。每次在批斗会上，没有理由，也没有解释，有的只是谩骂和口号、“放飞机”、吐口沫、拳打脚踢。打的越重，越说明那个“革

命群众”的觉悟高，对“阶级敌人”有仇恨心。因此斗争别人也是表现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那些相识的朋友也上来打我，打得我越凶，这是“划清界限”的时候。

有一次车间一个女积极分子接到有人给我打电话，她警惕性特高，为了划清阶级路线，加强对我专政，不叫我去听电话。对方无法，只得请她帮忙转告我“下班后到中山医院观察室碰头”。这个女积极马上去报告监督组，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我又被莫名其妙地现场揪斗。这个女人添油加酱地揭发说：“一个很年青的女人声音打电话找他，说话吞吞吐吐，通知他下班后在中山公园门口碰头。”马上有些人兴趣十足，边批斗边追问我，这个女的几岁？什么单位工作？长的怎么样？无中生有地讽刺我“这反革命倒风流，脚不好一边管制一边谈女朋友。”我一再申诉，没有女朋友，并发誓像我这种人不配，也不允许有女朋友。他们不死心，结果他们下班五点半派人监督押我到中山公园门口，躲在旁边等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赃俱获”，才灰心走了。我到家后才知道，是15岁的外甥女打电话到我厂里，通知我“外婆生病，住在中山医院观察室，下班后去看看病人情况。”第二天，我把这一实际情况转告了监督组，他们才将信将疑不再纠缠。

还有一次，也是个积极分子汇报揭发我，晚上打扫车间时，一边扫地，一边哼黄色歌曲，开心得很。于是他们又揪斗我，勒令我交代唱什么黄色歌曲？为什么开心？我如实说，哼唱了《宝贝》、《鸽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拉兹之歌》。他们批判我“反革命本心不变，用软绵绵的靡靡之音毒化空气、腐蚀工人同志的心灵，杀人不见血。”又喝问“你反革命还敢唱‘苏修’‘小偷’歌曲？真是‘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还追问“宝贝”是什么意思？是否想女人？“鸽子”是什么？现在没有和平，只有战争，与帝修反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就这样我又被批斗了二个多小时，少不了吃了他们三、四记耳光。

在厂里被监督管制的日子里，我始终不明白，二年多前曾和睦相处的工友同志们，怎么一下子变得个个对我不相识又怀着深仇大恨了？他们许多人变成了残酷无情的暴徒，出口毒骂我，动不动毒打我，他们究竟是人还是禽兽？或许这二年多中他们都经受了纳粹法西斯的训练，学得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可他们武装起来的究竟是什么思想？什么主义？我深感“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深感“六厂二校经验”的无比英明，我虽然一脚走出了关押人体的监狱，但一脚踏进了无时无刻不在摧残我精神，摧残我肉体的更大的社会监狱！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